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上)

Russia's Tortuous Road of Modernization

左凤荣 沈志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上)

Russia's Tortuous Road of Modernization

左凤荣 沈志华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编者的话

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 160 年。在这 160 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 20 年。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思·韦伯在 100 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 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这些丛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 30 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则旨在集近 30 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项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寻求社会共识，是博源基金会的工作之一。而《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就是上述研究和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须面对世界难局，重建我们的知识体系，这就形成了丛书的如下主题：现代性从何而来？中国是如何遭遇现代性的？当前中国为什么要提现代性转型？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状况及其约束条件是什么？现代性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是否还是一项绝对价值？是否存在“另类现代性”？各类国家现代性转型比较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等等。

为了更好地体现相关学科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先后组织了不同学科的领军人物进行深入讨论；伴随着每一次讨论，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直接拷问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实际上，这些学术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丛书的边界，是不同学科对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思想认知、碰撞与交融，从而使丛书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让大家发抒各自的专业研究成果与识见，以期从不同角度勾勒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基本轮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系博源基金会之“博源文库”的一个系列。本套丛书总序由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撰写。

博源基金会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

2009年9月30日

总 序

金耀基

博源基金会是由秦晓与何迪两位先生倡议成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体，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 100 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为此，博源基金会在 2008 年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课题的基础上，于 2009 年 3 月的理事会上又提出了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的构思，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社会共识，应该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

作之一。”

我很认同博源基金会诸君的看法与价值理念。百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国族求生存、发展而起的各种变革运动中，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包括清代“废科举，设学校”），到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1年国民党共和革命，1949年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一直到1978年开放改革所展开的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这一连串的变革运动背后，确有一股强烈的动力，那就是求国家之富强，求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但无可讳言，这一连串变革运动，不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都在向“现代的西方”借鉴学习，向西方取经（应指出，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它是“反西方的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到启蒙的价值理念（如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等）都一一进入中国。故百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成的。百年来一系列变革运动实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中国现代化。整体上，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过程，即是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亦即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程。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的富强（经济现代化是而且仅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一个主要以儒学三纲六纪为规范的帝国秩序）已倾圮解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其意涵实远不止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也不仅是像美国反殖民的独立革命，还是涉

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转型。

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150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脱亚入欧，可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值得特别指出者，日本的现代性之建立虽是以西方为范本，但是仍有强烈的日本文化的性格，故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日本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共相”，也有“异相”。无可否认，欧洲依启蒙运动建构的新文明形态是现代性的最早的个案。19世纪以后，欧洲一直被视为世界先进的文明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世界的“兵工厂”而转为资本主义“自由之堡垒”，亦自然而成为“西方现代性”之表率。但不能忘记，1917年俄国共产党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已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另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已形成一個挑战资本主义的世界力量。以俄国为领袖的苏维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更构成了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两大阵营。依马克思原本的理论讲，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或曰“超现代性”）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是以拥有更优越的制度、价值的文明性向世界宣称的。诚然，社会主义所描绘之彼岸的自由王国的理想是无比浪漫动人的。恰恰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比资本主义的也更大。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出现问题或异化，而“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冒进路线，更把中国推向亡党亡国的边缘，幸因1978年的开放、改革而转危为机。1991年，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不啻

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顿挫。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看法。他说那些可以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方案，已经彻底穷尽了，他说世界可能已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得到了普遍化，成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诚然，福山的论断具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性，须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不因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失败”而理所当然地取得终极的正当性。其实，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黑暗面，美国先后涉足与发动的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以维护自由与民主自居，却充分显露了霸道的政治性格，实不足以言为缔造全球政治秩序提供了范本。2008年10月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其殃源正在美国的华尔街，更透显了资本主义之经济秩序有深层的结构问题与道德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欧美思想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现代性论辩”，西方知识人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诚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作为西方现代性思想根源的启蒙运动的遗产，不是理性（Reason）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它不能导向启蒙思想家的希望（即普世的自由）的实现，而提出“铁箍”的警告。80年代的“现代性论辩”，循韦伯之思维，集中地表现为“理性的论辩”。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以济工具理性的不足，他是西方现代性的维护者，但他承认启蒙方案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可见到的是，西方的现代性依然在自身反思中逐步修正。我同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 Kolakowski）的看法，现代性方案是“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中”。

中国于 1978 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的废墟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发出改革开放的巨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力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过去有人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现今看来，应该是“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了。30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史无前见的成就。中国的崛起已是世界的事实。的确，中国扭转了 16 世纪以来西方日踞世界支配性地位的格局，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很大程度上已实现百年来追求的富强之梦。但是，我们要问，中国上升之路会一帆风顺吗？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在 21 世纪步向强国之路上，将无可避免地面临种种外在与内在的挑战与考验。在今日全球多元格局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止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说到底，它必须有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的真正愿景，如前所述，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我们今天距离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之建立还很远，即使就中国今天最有成就的经济领域而言，贫富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落差，市场规范的缺失，实在还未能完成一个经济的文明秩序。我们上面已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中，但社会转型并不会自动地成功地转向一个现代文明秩序。这一项巨大的文明转型的工程，它建构的主要资源来自社会主义，来自资本主义，也应该并必然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所建构的是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一点不夸张，它需要这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当代的知识人，以理性、批判的反思精神，贡献各自的心力与智力，来与国人共谱中国的历史新篇章。



博源基金会，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并志在为知识界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这个《现代性与社会转型丛书》正有幸得到多位知识界杰出学者的参与支持，各自独立地发抒其专业的研究成果与识见，欣赏敬佩之余，是为序。

金耀基

2009年7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主 题

引言	003
一 俄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传统	011
1. 外部压力推动的俄罗斯现代化最初进程	012
2. 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唤醒的一代革命者	016
3. 民粹派的俄国社会主义与斯托雷平改革	020
二 列宁对现代化道路的最初选择	029
1. 军事共产主义在实验中的失败	030
2.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探索和思考	036
3. 电气化计划及经济运行中的矛盾	041
4. 政治制度民主化滞后的必然结果	045
三 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	055
1. 以盘剥广大农民为前提的工业化	056
2. 把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核心	067
3. 不顾一切的高速度“赶超”战略	071
4. 政治保障：个人专权和残酷镇压	078

四 斯大林模式的代价和恶果	083
1. 行政命令体制和特权官僚队伍的形成	084
2. 民众被禁锢而失去主动性和创造力	089
3. 经济效率持续低下和结构严重失调	093
4. 压制国民消费导致社会生活长期贫困	101
五 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及其失败	107
1. 从改革农业政策入手探索“新方针”	107
2. 以批判个人崇拜为契机的民主改革	117
3. 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尝试	128
4. 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	134
5. 赫鲁晓夫未能摆脱斯大林模式的窠臼	139
六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与倒退	151
1. 强化对社会的政治思想控制	152
2. 中断柯西金的经济体制改革	155
3. 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形成	162
4. 党政干部终身制与老人政治	169
七 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危机	172
1. 体制倒退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173
2. 执迷于与西方的大规模军备竞赛	177
3. 民生经济严重滞后引发社会不满	181
4. 面对科技革命大潮的迷惘和盲目	187
八 试图重新开辟现代化道路的潜流	193
1. 民众对社会主义的麻木和失望	193
2. 社会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抗争活动	196
3. 党内领导层对现代化新路的诉求	204

.....

第一部分

主 题



引 言

关于什么是现代化的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进行过许多深入的研究，给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一般认为，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在俄语中，现代化一词（Модернизация）与“时髦”、“时兴”（Мода）是同根词。现代化的本义是，追求最时兴的东西，走在时代的前列。在社会的意义上，则是从封闭、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向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会演进。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的。

从历史发展上看，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国家，在俄国崛起于东欧大平原之时，欧洲已经相当发达了。因此，俄国现代化的特点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这种“赶超”又是极其片面的。对于缺少理性的俄罗斯人来说，“赶超”的主要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先进的工业和强大的军队；对于社会层面的东西，诸如法治、民主、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思想等，他们却很少触及。

俄国自认为是有欧洲文化传统的国家，其东正教与基督教同根同源。在与欧洲发达国家的比较中，俄国的落后

推动其努力追赶欧洲，俄国的有识之士也不断从西方文明和文化中为专制落后的俄国寻找启蒙的曙光。但是，俄国从来都没有完全认同或效仿过西欧的发达国家。当俄国在应对外部挑战时遇到了麻烦，感觉落后了，便求助于西方，努力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当他们感觉到自己已经强大起来了，便更多地强调俄国的特色，强调国家的欧亚属性。因此，幅员辽阔的俄国与发达的欧洲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恰恰制约了俄国的发展与进步。

俄国“赶超”欧洲发达国家始于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由此开启了俄国现代化的进程。虽然彼得一世的改革还谈不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进，但正是彼得大帝让俄国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并开始在许多方面效仿西方的发达国家。因此，本书在考察俄国现代化历程时以彼得时代为起点，或许这样能更好地说明俄国现代化的特点，更便于把俄国的传统与其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在彼得大帝改革的年代，尼德兰和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而在俄国依然保存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贵族地主居于支配地位。如果说西欧国家现代化伴随的是封建制度的崩溃、劳动力从对土地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俄国现代化呈现的则是相反的进程，彼得一世开启的俄国现代化进程与俄国农奴制的强化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同时伴随着宪政改革和政治民主化，俄国走的则是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专制之路。虽然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使俄国朝着农奴可以变成自由民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一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

俄国的迅速发展与崛起，都是与强有力的统治者的名

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斯大林等，他们都是自上而下地推动生产的发展，主要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和行政手段，引进西方的技术、人才和资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行政高压手段，以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把俄国强行推入世界强国之林。对于不顺从者，不是进行说服和争取工作，而是采用镇压手段，竭力保留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历史传统——这也是俄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却欲速不达。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和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这种情况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抑制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使社会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其结果，作为现代化的推行者，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又不断为其身后的发展设立难以突破的障碍。因此，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显现出大起大落的特点。

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及其领导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欧的现代化进程是社会前进、经济发展、思想进步的自然结果。一般是由内部自下而上自发的渐变过程，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结果，同时又常常与战争、革命紧密相联。北方战争的失败促使彼得一世学习西方，为了使俄国强大，他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把一切西方先进的技术都学到手；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促使亚历山大进行了一系列促进现代化的改革；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危机感促使斯大林不顾一切地加速进行工业化。危机感和国家权力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市场发育不足，俄国的现代化并非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带有在国家权力强制下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